

让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出场 ——对“现实个人”概念的存在论探讨

王德峰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个人；历史的前提；现象学褫夺；生存论的存在论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造成了对这一学说的“经济决定论”的或“生物主义”的读法。为了让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出场，要求我们去真正地领会使这一学说成为可能的新的存在论境域，即马克思在发动存在论革命时所开辟的生存论路向。本文从马克思对历史的前提的讨论入手，分析“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的存在论基础，借此展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之真谛，指出它对于旧哲学赋予历史世界的一切范畴规定的清洗。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2)01-0016-08

历史唯物主义问世至今，已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尽管人们一直给予它足够的关注，但对它的真知总是难以形成，特别是，它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学说，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对人类历史给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个看似早已无需再问的问题，其实还一直由于种种近代理解模式的限制而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此，事情还得从头做起。所谓“从头做起”，就是要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概念的重新理解开始，要首先在这个概念上清洗以往各种习以为常的成见。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概念是“现实个人”。在那部最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提出了“历史的前提”问题，并把这个前提表达为“现实的个人”。

把历史的前提规定为现实的个人，这似乎是一个极普通的常识，谁不知道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都是现实的个人呢？历史不是神

的活动，也不是动物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人既然不是一种神灵，亦非单纯的一种动物物种，就应当名之为实际存在着的人、或现实中的个人，事情似乎就这么简单。正是在这一简单的事情中，我们本该去发现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伟大洞见之起点，但事实上，我们总是首先在其中发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读法的起点。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读法，是一种在形而上学范式中的读法，但这种读法却总是以为自己读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或它的“唯物主义”原则。殊不知，正是在近代读法中，我们错失了马克思所完成的本体论革命。因此，为了让事情从其起点和来历上得到阐明，我们就必须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以一场本体论革命作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回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概念，即“现实个人”概念，来达到这一阐明。

【收稿日期】2002-04-16

—

谁都能很容易地说“现实的个人”这个词，仿佛一旦说出这个词，就同时说出了一项尽人皆知的、公开的真理，说出了你和我都是一些实际存在着的个人，也即，既非作为神灵、也非作为物的那个“人”。但是，在我们用这个词的背景中所隐藏着的理解，却还从来没有被深入地检审过。

由于未曾检审，我们就完全可能在误解“现实个人”时误解了马克思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

跟随着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我们确实不想把人理解为某种唯灵论的存在，也不想把他理解成动物式的存在，但我们其实又始终摆脱不了这两种理解。我们被夹在这两种理解之间，左右为难。

一方面，我们想到了人不单纯是物，因为，正是他的有意识性，他的精神品质，他的理性能力才使他有一部历史，使他不会沉陷于生命自然物的世代重演着的本能生活中。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记得，人即使有那部奇怪的、使人越出生物界的“历史”，却还是生物，因此历史应当被理解为人这种生物之特殊的生存方式，即，归根到底人还是物，只不过是一种有点特殊的物罢了。

于是，对人的规定似乎就应是这样的：人是理性加上生物性。用这个规定，我们试图摆脱上述两难处境，但其实却是逃遁。

熟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可以把这种逃遁隐藏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如下一种解释方案中。按照这一方案，我们不把理性外在地加到生物性上去，而是让理性表达在为生物性服务的人的经济规定性中，借此夺去理性的超验根据，即神性。因为“经济生活”本身乃是人的直接的、一目了然的“事实”，它甚至可以直接被理解为人生物性之“社会的”存在方式。“生物性”就是每个人的

肉体存在及其存活之不可遏止的需要，这种需要驱使人们建立经济关系以组织劳动并规定产品的分配方式。目的在于生物性利益，而经济关系只是生物性利益的理性化。正是人类这种理性化的能力，才使个人的生命能力得以在经济关系中联合起来，形成社会力量。

但是被如此这般描述的，恰恰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蒲鲁东先生的“伟大思想”。这个“伟大思想”的“伟大性”恰是源自于黑格尔。马克思在那部批判蒲鲁东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1)(P114)}

然而，马克思学说自身的命运竟是这样：人们总是要把他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就批判过的蒲鲁东思想再强加给他。马克思给世人的基本印象就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经济的唯物主义”。大家不是都看到了马克思的主要贡献是《资本论》吗？大家不是同样也看到《资本论》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辩证运动吗？马克思用这个辩证运动来指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逻辑根据，这不是一个经济学领域中的黑格尔主义者吗？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之自身展开的辩证逻辑，到了马克思手中不就是转变成了“生产方式”演进的辩证逻辑了吗？

谈论生产方式的逻辑，无疑就是把生产方式理性化。但这个理性的来历，却未曾被追问过，它停留为“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它是从天上掉到现实个人身上的东西，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神性”。这“神性”是一个

使历史成为可能的逻辑框架,现实个人在这个框架里获得自己的理性,从而用自己的有意识的活动去体现这个逻辑框架,换言之,这即是历史之逻辑框架的“先验性”。这一点,在形而上学的原理上等同于绝对理念通过人的思维达到自我意识。

因此,结论应当是:把自我意识的逻辑转化为生产方式的逻辑,并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化”。

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即“生命人本学”的选择。

人的生物性存在要求他身上的对象性的生命力量外化自身,在此外化中,个人的自然意识直观到他人也是一种生命力量,由此而把自己看成“类的存在物”,理性由此发生。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根据一种理解,马克思正是由此出发的,他把理性理解为人的生物性之达到对自身类存在的自觉,而这个自觉(理性)就可以成为人的生命力量在外化自身时所采用的工具、手段。

这在形而上学原理中,应当被明确表达为:把理性还原为感性直观,或者说,追溯理性在人对人的感性直观中的起源。

费尔巴哈赋予“感性直观”以本体论的意义,使它超出知识论范畴,这是他的功绩,但它仍然从属于“形而上学原理”。作为人的理性之本源的“感性直观”,向来就存在,因此而亘古不变。在亘古不变的“感性直观”中,现实个人应当直接地就是类的存在物,他的“理性的感性”应当实现为他的“作为人的”生活状况。但是,很不幸的是,费尔巴哈在现实中只能直观到“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1](P50)}。这就使得作为理性之天然根源的“感性直观”本身仍然是出自理性的一个形而上学设定——“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因为,现实的个人在其感性直观中迄今为止还从未看到过体现

在另一个现实个人身上的“人类”。

看来,我们仍然陷于现实个人等于“理性加生物性”这样一个公式中难以自拔!在这个公式中,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未能出场。

二

事情因此已经表明:只有认真地去清洗“理性加生物性”这一公式,才能让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出场。

如何清洗?还是要从“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入手,但入手的路径非改不可。

“理性”和“生物性”都是形而上学的范畴规定,倘若一开始就现成地拿起这两个范畴规定,我们非但不能向“现实的个人”靠近一步,而是立即就远离了它。

让我们一开始就允许“现实的个人”自身出场吧,不要事先就给它搭好一个舞台。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

假如这个现实的个人是资本家,那么他还无法“自身出场”,因为他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在此已是一个范畴规定,即经济学上的规定。假如他是一个“劳动者”,那么,他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是“雇佣劳动者”,而不是只在人类学抽象中才存在的“一般劳动者”。其实,“一般劳动者”也好,“雇佣劳动者”也好,都分别是人类学和经济学上的范畴规定,都是在知识论上为他的活动预先搭好的舞台架子,他在这个舞台上只能作为体现舞台架子的逻辑意义的“角色”而出场。他没有作为他自身出场。他在这个舞台上的所谓“现实性”,其实统统是范畴规定的现实性。他因此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作为范畴之肉身化—人格化的人。范畴的肉身化,即是他的“物质存在”,而范畴的人格化则是他“精神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倒是在这种范畴的肉身化与人格化的统一中结合在一起了。遗憾的是,在这种结合中,我们还是未曾达到历史唯物

主义。

只有在澄清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让马克思自己前来与我们照面，即倾听他如何按他的说法采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让“现实的个人”出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1〕}(P24)

所谓“纯粹经验的方法”，绝不能被理解为近代哲学上的“经验论”的实证方法。马克思的用语并不是“当代的”，故而他的用语所引起的对近代哲学的联想常易纠缠着我们。必须摆脱术语之障，应当去领会马克思之所谓“纯粹经验的”乃指“清洗一切范畴规定的”。种种作为范畴规定之前提，即是马克思所讲的作为“教条”的前提。清洗范畴规定，即是清洗教条，把笼罩在现实个人身上的“肉身存在”与“人格存在”之蔽予以消解。在消解之后，我们才看到了这样的“现实个人”：他们的“活动”及其“条件”。

这是对“现实个人”——亦即历史之成为历史的真正前提——的一个简约的规定。人们曾经轻忽地看待了这个简约的规定。人们从这个规定中只是读到了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外部物质环境。谁都愿意承认这一规定，其中似乎并无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在这里只是为历史确定了一个生物学的前提吗，从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就只是一种生命哲学上的规定吗？全部误解的开端就生发于这种轻忽的理解之中。

马克思确实一开始就直陈了“生命哲学上的规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

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1〕}(P24)

假如马克思仅仅根据这一点说历史的前提，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无非是关于历史的生物主义。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当我们仅只确认人是现实的一个生命物种时，历史就还根本没有被提到。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个体，它的肉体组织所规定的生命机制无论怎样展开，也不会形成历史。黑猩猩展开了多少年，但它们没有历史。所以马克思紧接着说，“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P24)。所谓“不能”，其实是“不必”，否则便是准备写“生物学”和“地理学”著作。历史的前提问题就此立即从生命哲学的规定性转向存在论的规定上去了。也就是说，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对人的生命活动必须达成一种存在论上的理解，并且只有根据这种理解才能展开对历史之前提的讨论。

人要吃喝穿住，这是每一个哲学家都知道的事。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肉体，确实是在利用生命机制谈历史的前提。马克思利用生命机制是针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的。如果说历史的前提是自我意识，这自我意识如何有一个周围环境、世界？如果说“有”，只是一种虚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批判黑格尔时指出，黑格尔的外部世界只是作为纯粹的思想物的“物相”，而不是真正的自然界。所以，马克思首先要谈论历史的“自然基础”问题。不过，对这个“自然基础”要有一个新的谈法。

旧的谈法，亦即生物主义的谈法，只是谈出了一个儿童也知道常识而已。人不仅仅是像一个生物那样去行事，它实际上用了

一种超出单纯自然的方式去解决吃喝穿住的问题。这就是说,那个连儿童也知道的常识原来是需要解释的。马克思在提出历史的前提问题时绝不是简单地退回到这个常识上来,而是要对这个常识作非唯心主义的、非知识论的(亦即不是以理性为前提的)解释。只有把人和世界的认知关系设定为前提,才能设想历史的前提是理性,即,以为我们是在认知的指导下,在某种基本知识给定了的情况下,改造世界,实现吃喝穿住。这一点被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基本确定下来了。

必须反对这种由理性存在论所导致的设定,但又不能返回生物主义,问题的关键在此。西方存在论的传统因此必须扬弃。这一番扬弃的工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的,其最终成果是得到“感性活动”之概念。有了感性活动的概念,就有了对历史的“自然基础”的一种新的谈法。在这种谈法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再是作为生命存在机制的自然基础,而是作为在活动中被改变着的自然基础。这样的自然基础,立即就越出了生物主义,而进入了一种新的存在论理解中。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存在论领域中发动的革命,以便准确地理解“感性活动”这个概念。对于确立“感性活动”这个概念来说,“手稿”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性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

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2](P167)}

对于这段话,我们要领会其三个要点。

其一,提出了在生命哲学范围内的对象性原理。根据这个原理,人不是作为某种现成的精神主体而面对着在其外部的周围物质环境。相反地,它即是自然界,也即,它一开始就因其生命存在的机制而被它的生命需要的对象所设定,所以,它的存在不是“内在的”,而是“在外的”。

其二,正因为它是本来就“在外的”,所以,它的活动一定是“对象性的活动”,亦即是把自己的“在外存在”设定为“异己对象”的活动,而不是把“自己的纯粹的活动”外化为对象。

其三,对象性活动之所以是“活动”,是因为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有“主体性”。但“主体性”绝不能被当作“主体自身”。人不是某种“现成的主体”,“主体性”只是指它对自己的“在外存在”的领会。马克思在后文中把这一点表达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2](P169)}。这个自身,不是“现成主体”,而是“在自然界中的在”。人必得要关切自己这个“在自然界中的在”,因为它的这个“在”不是现成的“肉体的在”,而是必须由它自己去达到的“感性存在”。

由上述第三点看,动物的“活动”其实不是活动,因为它未曾领会着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

由上述第二点看,对象性活动不是主体把自身的本质外化为对象的活动,人没有这种内在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处在存在的敞开领域中,马克思把这叫做“它本来就是自然界”。所以,对象性活动与其被近代式地

表达为“设定异己的对象”，不如被表达为“把自己的‘在外存在’（即‘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实现为世界”。

上述三个要点构成了感性活动概念的基本内涵。正是在此概念中，一场存在论的革命已经发生。存在论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知识论路向被扬弃了，一条生存论的路向则被打开。

我们用“生存论的”这一提法表达对生命哲学规定的“现象学褫夺”。这里所谓“现象学的褫夺”，是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是把现象学方法视为摆脱知识论的存在论的惟一可能途径。^[3]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同样看到了这种存在论新路向的出现。只有褫夺了现成给定的存在者规定，才可能让存在者的存在性质自身显露出来。马克思用“人是感性的活动”这一现象学表达式褫夺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关于人是“感性的对象”这一存在者规定。

由此，我们才终于能够看到“现实的个人”的存在论根基正是“感性活动”。从“感性活动”出发，现实个人的肉体存在就不是一个现成的自然物的存在，而勿宁应当被表达为在其活动的历史性当中生成着的“感性存在”。而这个感性存在，就其现实性的一面而言，恰就是现实个人之活动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其可能性的一面而言，则是现实个人的“感性意识”。

这就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现实前提”。在这个只有根据出自某种教条的虚构才能加以否定的前提中，既无旧的“唯物主义”，也无只讲生命机制的“生物主义”，有的只是新的存在论原则，即生存论的存在论。

于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如下这一表述就是既明白又顺理成章的了：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

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1](P24-25)}

马克思在这里紧紧抓住了“生产”来谈论人的本质，尽管仍然强调了生命机制是“生产”的生物学前提，但是却把这个生物学前提看作是仅当我们只讨论“人的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时才有效，也就是说，若我们不讨论历史时，“生产”便降格为“生命机制”，而一旦讨论历史，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即“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所谓“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就是生产着他们的感性存在、他们的在世之在。

这里原有两句话：“人们生产着他们所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前一句话是生命哲学的，后一句话是生存论的。但马克思在这里的表述即还是有着某种不彻底性，因为他加上了“间接地”一词，就是说，他认为，首先承认“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是对历史作唯物主义解释之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既然唯物主义原则已在感性活动概念中被“生存论地”加以改造，既然肉体存在已被现象学地褫夺为感性存在，本可不必再去迁就生命哲学的表达式。“生产”的存在论意义本已鲜明：它是人的感性存在之生成。

三

仅当我们谈到人的感性存在之时，我们才真正地在谈论“世界”。

“世界”何意？人们或许想到它是“诸存在者总体”，然后又想到在诸存在者中间有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人”，它在这个总体中，因此它在世界中。但现实的个人却不是这样一种意义上“有世界的”存在者。现实的个人是感性活动，他们只是在他们的感性活动中，才是在世界中。

“在世界中”之“世界”，是指物质生活条件。“条件”是一个近代哲学术语。马克思始终使用近代哲学术语，但其原则是生存论的。他不会说现实的个人就是他们的活动以及由活动所处理的外部自然物，他不把“世界”理解为外部自然物的总和，而是把它表达为“物质生活条件”。他说“条件”，就是说“活动的条件”，条件不能与活动分开。把感性活动去掉，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没有了，只有形而上学地设想出来的外部现成的自然物（外部物质环境）。所以，马克思在“现实的个人”这样一个生存论概念中，其实已经述说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在本质上就是存在”。海德格尔不用“感性”这个词，因为“感性”是近代范畴。我们以前研究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比他的前辈高明，因为他已经把“感性”和“活动”结合起来，是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结合。这种理解其实只是皮相的理解。若在生存论的境域中理解感性，感性即是活动，活动即是感性，并没有“加起来”这一说。海德格尔是这样说的：此在本质上包含在世，所以此在的向世存在（即面向、朝向世界的存在）本质上就是烦忙。无论在存在者状态上，还是在存在论上，烦忙在世都具有优先地位。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烦忙的描述均为感性活动之描述。他谈到用具以及用具中包含的“指引”，在“指引的整体性”中产生“因缘的整体性”，世界之为世界就出现了。这一套说法其实也都是对感性活动的生存论描述。他不说我们现实地碰到一个自在之物、一个存在者，然后在我们认识它之后才使用它；我们先知道它在什么范畴规定中，然后它才成为我们的工具。相反，我们自身就是烦忙，我们在烦忙寻视，找到上手的东西。我们找到的原不是在理论上认识到的东西。

马克思未曾在对感性活动的存在论分析中停留，他只求自己在存在论境域上搞清楚

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不是准备拿出来给别人读的一部存在论作品。他只是想让他存在论革命的成果——历史唯物主义——直接出场，以便告诉我们只要根据“现实的个人”（感性活动及其条件）这一现实前提，就可以为整个历史世界描述其生存论上的结构，而不再需要任何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辨。

正是在“现实的个人”这种生存论涵意中，我们才得以把“物质生活条件”理解为历史世界，才得以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1)(P50)}这就是说，世界本质上包含在现实个人的活动中。这在海德格尔那里用现象学的话被表达为“世界现象”。世界现象哪里来？从此在的本质当中来，而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从感性活动中来，物质生活条件就从感性活动中来。因此，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境域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体会：现实感性世界出自现实个人的本质结构之历史的展示方式。

然而，在这里是否可能发生一个危险，即，把马克思学说置入某种先验原则中去？在这里，我们只能大致地谈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基本见解：生存论路向并没有抛弃先验哲学所取得的一个个思想成果，因此，我们不能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所经验到的东西当成向来就给定的自在的事实性。如果我们竟是在前康德的水平上返回到既成的经验事实的后天规定中去，以为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其实是在与抽象的经验论者们为伍，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毫不相关。

康德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于指出：我们不能谈论感性经验的自在的直接性、第一性，经验是被建构起来的，经验之建构即是人心验前地先行关涉到存在。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生存论路向上的哲学并不轻易地抛弃这一突破所带来的启发。

那么，生存论的分析与先验原则的区别

在哪里呢?

先验的分析是在纯粹逻辑的层面上描述理性的自我贯彻、自我展开,这尤其体现在黑格尔的存在论中。经验的存在物都是理性的自我贯彻、自我展开之外化,因此,真理是一个过程,它是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活动过程,它的外化及其扬弃就形成一部经验世界的历史。至于生存论分析的“先天性质”,乃是表明范畴向着存在之意义的源始贯彻。现实的个人就是这种源始贯彻。海德格尔则说: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的,否则,它就不叫“此在”,而是立刻下降为一个动物、一个物、一个现成的存在者。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表

达的: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人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这其实都是在讲对存在之意义的源始贯彻。

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个人”是有其存在论革命上的来历的,而这个来历是要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去探寻的。只有经过一番不无艰难的探寻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物质生活条件”不是现成在外的物质环境,而是源自“现实个人”的本质规定。这个本质规定,即是那源始地进入到存在领域中去的感性活动。这一切都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存论境域。惟有跨入这一境域,我们才有可能让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出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

- 版社,1979.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

[作者王德峰,男,哲学博士,研究员。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200433]

(责任编辑 卢云昆)

ABSTRACTS

Some Reflections on Culture

TANG Yi-jie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is a process of two-way choice. Thus, cultural development on a foreign land might be in one orientation. Real cultural exchange is to transmit our fine culture to others. We should take "Chinese culture" as the "object" of a systemic, creative and down-to-earth study if the tru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is to be revealed.

Le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self Emerge

—An ont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 "actual individual"

WANG De-feng

For a long tim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een interpreted in the mode of modern metaphysics, and this has resulted in its being understood as "economic determinism" or "biologism". To le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self emerg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new ontological horizon which has made this historical doctrine possible. As we know, Karl Marx initiated an existential approach to ontological thinking when he started a revolution in ontology. This essay begin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 premise described by Marx, analyzes the ontological base of the concept, and by means of this, demonstrates the real core of Marx's materialism and its clearance of all categorical definitions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through criticizing all old philosophies.

Today's Challenge to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Self-Realization

FENG Chua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completing and perfecting one's nature, this paper, in its first part, tries to give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is traditional concept to highlight the idea of self-realization inherent in it. And, by comparing it with some Western ideas, it tries to explain, in the second part, why this Confucian idea is not ready to meet the challenge coming from Western individualism.